

Newsletter of
International Liaison Committee for
Dunhuang Studies

主編 / 郝春文

2017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
通訊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 主辦
首都師範大學古文獻研究中心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 2017

2017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

2017 Newsletter of International Liaison Committee
for Dunhuang Studies

高田時雄 柴劍虹

策劃

郝春文

主編

陳大為

副主編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

首都師範大學古文獻研究中心

主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7.上海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2017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 / 郝春文主編.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325-8499-4

I. ①2… II. ①郝… III. ①敦煌學—叢刊 IV.
①K870.6-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140941 號

2017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

郝春文 主編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l@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惠敦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18.25 插頁 4 字數 320,000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8499-4

K·2340 定價: 8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2017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

目錄

學術綜述

2016 年敦煌學研究綜述	宋雪春(1)
2016 年吐魯番學研究綜述	賀 鋼 徐瑞瑞(36)
敦煌詩歌研究百年綜述	侯成成(74)
劉薩訶研究綜述	紀應昕(96)

會議介紹

2016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理事會暨敦煌學學術研討會綜述	葉如清(105)
交融與創新的盛會 ——“紀念莫高窟創建 1650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張先堂 李 國(108)
一次絲路文化研究的學術盛會 ——“考古與藝術,文本與歷史”絲綢之路研究新視野國際學術 研討會會議綜述	楊冰華(123)

書評

《敦煌學輯刊》與當代敦煌學	劉全波(136)
《吐蕃至歸義軍時期敦煌佛教經濟研究》評介	朱國立(143)

出版信息

書訊二則	楊 蓉 徐曉萌(149)
------------	----------------

論文

饒公觀音貫古今

- 淺談饒宗頤教授筆下唐代觀音菩薩畫像 駱慧瑛(151)

考察日記

- 赴蘇考察敦煌寫卷日記摘抄(1991.5.1—6.10) 柴劍虹(163)

學會信息

-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新入會成員名單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秘書處(181)

論著目錄

- 2016 年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 宋雪春(183)

- 2016 年吐魯番學研究論著目錄 徐瑞瑞 賀 鋼(206)

- 2014 年日本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 林生海(225)

- 2015 年日本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 林生海(248)

- 2011—2016 年中古法律史研究論著目錄 閻強樂(263)

-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稿約 (287)

2016 年敦煌學研究綜述

宋雪春(華東師範大學)

據不完全統計,2016 年度大陸地區出版與敦煌學相關的學術專著 60 餘部,公開發表研究論文 400 多篇。茲分概說、歷史地理、社會文化、宗教、語言文字、文學、藝術、考古與文物保護、少數民族歷史語言、古籍、科技、書評與學術動態等十二個專題擇要介紹如下。

一、概 說

本年度有關莫高窟史話、敦煌文化概說、絲綢之路與敦煌學、敦煌歷史人物考述、敦煌文獻釋錄與刊佈等研究成果較為突出。樊錦詩《莫高窟史話》(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講述了絲綢之路是中古時期一條曾經對中外經濟文化交流起過重大作用的國際通道。從中國中心部的都市長安向西,經過無數的山川與城市,穿越沙漠、戈壁與綠洲,一直通向地中海的東岸,絲綢之路沿綫各地區各民族的文化,就因絲綢之路的發達而得到促進。此外,回顧敦煌文化、敦煌遺書的概述性著作十分豐富,如有胡同慶《敦煌文化》(甘肅文化出版社)、雒青之《百年敦煌》(敦煌文藝出版社)、郝春文《敦煌遺書》(瀟江出版社)、姜德治《敦煌史話(修訂本)》(甘肅文化出版社)等。齊陳駿《回望絲綢之路與敦煌學的研究》(《社會科學戰綫》3 期)對其敦煌學研究學術歷程的梳理,為學界提供了敦煌學學術史上的歷史細節。王晶波《中西文化交流視野下的敦煌學》(《敦煌學輯刊》3 期)從中外交流與文化心態的角度,將敦煌學百餘年來的發展歷史歸納為文化失守、文化保守、文化自信三個階段,聯繫現代學術的發展,分析論述了各個階段的不同文化內涵、表現特點及意義。

釋法寶著、王平先譯《敦煌莫高窟——見證佛教的榮光與世界文化遺產》(《敦煌研究》6 期),從佛陀認可的審美創意著手,闡述了佛教藝術形式的發展與演變情況,進而揭示了作為佛教藝術寶庫和世界文化遺產的敦煌莫高窟的重要價值。柴劍虹《“時”“地”“人”——莫高窟開窟因緣述略》(《敦煌研究》6 期)從“時”(時代背景)、“地”(地理環境)、“人”(求法開窟僧)三個方面,綜合論述了一千六百多年前敦煌莫高窟的開窟因緣,推測樂傳等人最初營造的佛窟形式與內容,一定是既有濃郁的中亞、西域風貌,又融合了中原漢地風格,展現出多民族文化藝術風情,為一個多元文明、昌盛繁榮的莫高窟的形成與發展,奠定了扎實的基礎。榮新江《敦煌城與莫高窟的歷史概觀》(《敦

煌研究》5 期)通過考察敦煌莫高窟有關佛教傳入中國的壁畫以及最早記載敦煌佛教痕跡的一枚東漢漢簡,探討了敦煌佛教的發展過程,闡釋了莫高窟佛教藝術風格的流變及其在中國佛教史上的重要意義。張涌泉《走近敦煌》(《社會科學戰綫》3 期)指出,從敦煌變文的校理到敦煌文獻的系統整理,從敦煌俗字的辨識到《敦煌文獻語言大詞典》的編纂,從敦煌變文寫本特點的探索到敦煌寫本文獻學學術體系的建構以及敦煌殘卷的綴合,作者已在敦煌學的道路上耕耘了 30 多個春秋,他的學術生命已和敦煌融為一體。

李瑞哲《古代絲綢之路商隊運營面臨的危險以及應對措施》(《敦煌學輯刊》3 期)指出,古代絲綢之路商隊除了在沿途綠洲城市的驛館居住外,有時也會在野外露宿。為了應對危險,沿途還要雇用當地的嚮導,並且擁有武裝來保護他們的商隊。胡同慶《敦煌文獻“水是人血脈”出處溯源》(《敦煌學輯刊》4 期)指出,“水是人血脈”並非出自普遍認為的敦煌文獻 S.5894,而是 S.5874,強調這句話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在敦煌莫高窟開啓百餘年後的今天,敦煌學術史日益受到敦煌學界的重視,對於敦煌歷史人物的考述是其中的重要一環。王冀青《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察期間在敦煌獲取漢文寫經之過程研究》(《敦煌研究》6 期)根據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察日記、帳簿等檔案資料,探討了斯坦因 1914 年再訪敦煌期間購買漢文寫經的全過程;《斯坦因探訪鎖陽城遺址時間考》(《敦煌學輯刊》1 期)主要依據英藏斯坦因第二次中亞考察日記等材料,對斯坦因在鎖陽城遺址考古的前後過程進行了初步的研究,揭示了斯坦因在鎖陽城遺址考古的時間順序和工作經過。方廣錫《王道士名稱考》(《敦煌研究》4 期)考察了關於王道士名稱的六種原始資料後指出:王道士俗名王福琳,出家為道士後稱王園祿,逝世後按照道教習俗被稱為王園籙。至於目前最為流行的王圓籙,至今並未發現確鑿的文獻依據。按照“名從主人”的原則,應將王道士稱作王園祿。林世田、楊學勇《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學著述考〉略釋》(《敦煌學輯刊》1 期)指出,中國國家圖書館新發現的陸翔《敦煌學著述考》把宣統元年(1909)至民國三十三年(1944)之間的相關敦煌學成果分“紀述”“敘錄”“錄文”“傳真”“考證”五類分別作了考釋,體現出了三方面的學術價值。宋雪春、董大學《百年來英藏敦煌漢文文獻編目成果述評》(《敦煌研究》5 期)指出,自蔣孝琬的最初編目至《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之“條記目錄”,英藏敦煌漢文文獻相關編目成果已達十餘種之多,不斷推進了英藏敦煌漢文文獻研究的進步。考察各種目錄的成就與特色、相互間的異同,有益於甄別諸種編目成果的得與失;而比較諸種目錄所著錄條目之多寡,則有助於明晰編目工作動態的進步之道。周國林、邱亞《張舜徽先生的西北文獻與敦煌學研

究》(《敦煌學輯刊》1 期)介紹了張舜徽的敦煌學研究成就:1946 年至 1948 年,張舜徽於教學、讀書之餘,憑藉地理之便,積極搜求西北文獻和敦煌學文獻,最終利用敦煌古寫本《說苑·反質》殘卷,撰成《敦煌古寫本〈說苑〉殘卷校勘記》一文,不僅對研究《說苑·反質》有所補益,對後世研究敦煌學文獻、開展文獻學理論探討都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劉進寶《向達敦煌考察的身份問題研究平議》(《中華文史論叢》2 期)指出,向達是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和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之聘參加考察的,由於當時史語所和中央博物院形同一家,而史語所已有勞幹、石璋如參加,向達就代表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在北京大學只是“請假一年”。後來北大的態度從開始的無所謂到積極的參與,向達也從開始以個人的身份“請假一年”到強調代表北大,並為下次合組西北科學考察團奠定了基礎。伏俊璉、張志傑《蘇瑩輝先生敦煌學研究述要——紀念先生誕辰 100 周年》(《敦煌研究》1 期)評價道:蘇瑩輝先生在敦煌史地、敦煌石窟藝術、敦煌寫本文獻、敦煌文學、石窟考古等領域都取得了卓越成就。同時,蘇先生還十分注重對國際敦煌學研究史的總結和介紹,並且積極撰寫有關敦煌學的普及讀物,對我國敦煌學的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鄭阿財《黃永武先生與敦煌學及其敦煌唐詩研究之成就》(《敦煌研究》3 期)介紹了黃永武先生的學術簡歷,藉以彰顯其學術背景,論述其總體學術成果與特色;說明其對敦煌文獻編纂工作的貢獻,析論其在敦煌唐詩研究的重要成就以及其他有關敦煌文獻叢考的具體呈現;並附錄黃永武先生敦煌學研究論著集目,以供學界完整之參考。柴劍虹《俄羅斯漢學家孟列夫對國際敦煌學的貢獻》(《敦煌學輯刊》3 期)論述了俄羅斯漢學家孟列夫(俄文名緬希科夫,Л. Н. Меньшиков)對國際敦煌學作出的傑出貢獻,指出他從 1957 年至 2005 年近五十年間,積極從事中俄文化交流和俄藏敦煌文獻的編目與寫本研究。

敦煌文獻的整理、釋錄與刊佈在本年度取得新的重要成果。郝春文主編《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第十四卷於 2016 年 10 月出版,釋錄了《英藏敦煌文獻》第四卷所收寫本 S.2771—2999 號,並對每一件文書的定名、定性和寫本形態、研究狀況等給予介紹和說明。方廣錫、李際寧、黃霞《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總目錄·館藏目錄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以條記目錄的方式,從文物、文獻、文字三個方面,全面採集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的各種研究信息,對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作了詳盡的著錄,並在前言中對國圖敦煌遺書入藏、現狀、編目做了較為詳細的介紹。金雅聲、趙德安、沙木主編《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獻》(上海古籍出版社)第八冊出版,著錄編號至 42 號。另由金雅聲、郭恩主編《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獻》(上海古籍出版社)於本年度出版第十九和二十兩

冊,著錄編號至 P.T.1425。方廣鋁編著《濱田德海蒐藏敦煌遺書》(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共收錄濱田藏品 36 件,分析了這批藏品的寫本時代、寫本長度、文獻內容、文獻特點等。郝春文主編《2016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上海古籍出版社)為敦煌吐魯番學會 2016 年刊,刊發的學術研究綜述涉及 2015 年度的敦煌學、吐魯番學、敦煌佛教研究、敦煌講經文研究、大陸回鶻文經濟文書研究,並有近期的學術會議介紹,同時刊發了與學術綜述相關的書目、2012 年至 2013 年日本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2009 年以來中國大陸敦煌學博碩士學位論文、近六十年河西魏晉十六國壁畫墓研究著述等。

二、歷史地理

敦煌史地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歸義軍政治史、經濟史、民族交往史等方面,另外涉及敦煌圖經和法律文書。朱雷《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為敦煌吐魯番文書與中古社會經濟研究方面的專題論文集,共由 27 篇論文組成,涉及敦煌吐魯番文書中蘊含的經濟制度研究、與經濟相關的唐五代敦煌吐魯番文書的考釋和閱讀劄記、紀念唐長孺與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的散文等幾個方面的內容。劉進寶《敦煌文書與中古社會經濟》(浙江大學出版社)分四章,以敦煌文書為研究的切入點,論述了唐宋之際的社會變化、敦煌寺院與社會生活、階層與階級、經濟與社會四個專題。官齋勞動是歸義軍時期敦煌百姓承擔的雜役,官員、衙前子弟、色役人等出現於官齋勞動中表明其本身雖免雜役,但不能影庇戶內其他丁男。趙大旺《歸義軍政權對徭役影庇的限制——以 P.3231〈平康鄉官齋籍〉為主》(《敦煌研究》2 期)認為,這種對徭役影庇的限制與中原地區的政策是一致的,歸義軍時期官員等政府服務人員出現於官齋及其他雜役中,顯示其限制政策得到了較為充分的落實。楊寶玉《大中五年張議潭入奏相關問題辨析——以杏雨書屋藏羽 032—1〈驛程記〉為中心》(《敦煌研究》6 期)首先對前賢提出的杏雨書屋藏敦煌文書羽 032—1《驛程記》是大中五年張議潭使團前往京城長安的行程記錄的觀點補充了幾點論據;隨後主要據《驛程記》探討了有關該次入奏活動的幾個有爭議的問題,認為該使團到朝時間和歸義軍正式設立時間可分別確定為大中五年十月、十一月;同時對近年有學者提出的 P.3750 書狀中的入奏押衙王敬翼屬張議潭使團的說法提出了異議。同作者《〈張淮深碑〉抄件卷背詩文作者考辨》(《敦煌學輯刊》2 期)通過對《張淮深碑》抄件卷背所存詩文的認真研讀,首先分析歸納了詩文中透露出的作者信息,發現詩文作者原本來自江南,至寫這些詩時已在敦煌生活了約三十年,與當時當地人事的交集頗多,結合其他敦煌文書和敦煌史事,集中論證了詩文作者即當為張球的觀點。王使臻

《張議潮付張淮深“委曲書信考”》(《敦煌學輯刊》4 期)通過對法藏 P.3750 書信中相關人物的考證及書信本身書法特徵的比較研究,認為它是晚唐大中十二年七月二十日,由歸義軍節度使張議潮寫給其侄子張淮深的書信,這一類書信被當時人稱為“委曲”體書信。

政治史方面。孟憲實《略論折衝府的“承直馬”——以敦煌吐魯番出土文書為中心》(《西域研究》3 期)從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中發現,前庭府的常備馬匹恰好是八十匹,與文獻記載相吻合。因為西州屬於邊州,在承直馬的使用上有許多特色,與文獻記載多有不同。該氏《論唐代府兵制下的馱馬之制》(《敦煌吐魯番研究》十六卷)認為,“十馱馬”與“六馱馬”一樣都屬於唐朝府兵制下的馱馬之制,但“十馱馬”並非與“六馱馬”同時施行,雙方是一種交互使用的關係,而唐朝府兵制時代的馱馬之制其實是一種富有彈性的制度。沈如泉《敦煌伯 3813 唐判與宋代花判》(《敦煌研究》1 期)指出,就文體淵源而言,敦煌伯 3813 唐判中部分判詞雖無“花判”之名,卻基本具備了後世花判的主要特點,實為宋代花判之濫觴。李軍《敦煌的張淮深時代——以歸義軍與唐中央之關係為中心》(《敦煌吐魯番研究》十六卷)從微觀的角度觀察歸義軍與唐中央政府關係演變及其對河隴政局的影響。劉子凡《唐代使職借印考——以敦煌吐魯番文書為中心》(《敦煌吐魯番研究》十六卷)結合出土文書與傳世史料,討論唐代使職差遣臨時借用官印的現象,藉此管窺唐代文書用印制度在實際運行中的狀況。趙貞《歸義軍曹氏時期的鳥形押補遺》(《敦煌吐魯番研究》十六卷)進一步對敦煌文獻中的鳥形簽署和畫押進行補遺,力求對曹氏歸義軍鳥形押的梳理趨於完整。鄭紅翔《唐蕃青海之戰與隴右軍事力量的初創》(《敦煌學輯刊》4 期)考證了青海之戰的時間和戰役細節,並分析了唐政府新置的三軍。梁松濤、田曉霽《西夏“權官”問題初探》(《敦煌學輯刊》4 期)討論了西夏時期權官的類別,主要有“權正”“權正統”“權小監”“權檢校”“權都案”“權案頭”“權正首領”“權首領”八種,指出西夏時期的權官有兩個顯著特點:西夏“權官”涉及文武,但以武官體系為多;西夏“權官”的選派須遵守嚴格的秩序。陳光文《西夏時期敦煌的行政建制與職官設置》(《敦煌研究》5 期)指出,西夏佔據敦煌後,在瓜州、沙州建立了完備的行政體系,並委派豪酋大族實行統治。瓜州和沙州位於西夏邊陲,軍事作用突出,因此西夏在二州分別設立監軍司,負責當地的軍事與行政事務。同時在二州分別設立刺史、轉運司。沙州單獨設立經制司。都統軍、副統軍、監軍使、通判、習判、承旨、都案、案頭等自上而下構成了瓜、沙二州的職官體系。鄭煒《略論宋初以貿易手段遏制夷狄入侵的思想》(《敦煌學輯刊》4 期)認為,北宋統治階層產生了以貿易手段遏制夷狄入侵的思想,該思想的具體實踐對宋遼之間

維繫長久的和平產生了積極影響；由此產生的對夏貿易政策卻成為西夏屢屢進犯的重要原因。

周尚兵《P.3723 魯地禮物清單所示唐代山東社會生產》（《敦煌研究》4 期）指出，敦煌文書 P.3723 中的魯地禮物清單與唐代山東貢品清單互為補充，較全面地展示了唐代山東特色物產，可復原出唐代山東地域 18 類社會生產的基本脈絡。郁曉剛《敦煌寺院會計憑證考釋》（《敦煌研究》5 期）對判、施捨疏、取抄署、契據等幾種會計憑證的形制特點及其在會計核算活動中的使用狀況進行了具體辨析，指出敦煌寺院十分重視會計憑證的製作、整理、審核與保管。楊誼時、石乃玉、史志林《考古發現所見河西走廊史前的農業雙向傳播》（《敦煌學輯刊》1 期）通過梳理和對比河西走廊及其鄰近地區考古遺址出土的植物大化石、骨骼碳氮同位素結果和種子碳十四測年結果，探討距今 5000—3000 年粟黍西漸和麥類東傳的時間和路線，認為在距今 5000 年前後，隨著馬家窑文化西進至河西走廊，粟黍農業在距今 5000—4400 年傳播至河西走廊並得以發展，在距今 4400—4200 年傳播至歐亞草原中部哈薩克斯坦地區。

圖經方面。李并成《敦煌本唐代圖經再考》（《中國地方志》12 期）指出，敦煌遺書中保存了 8 件唐代圖經，是今天所能見到的僅有的唐代圖經原件。唐代圖經內容翔實、體例嚴整、地方特色突出、注重實用價值，是已經發展到成熟階段的成型方志。

法律方面。顧凌雲《從敦煌吐魯番出土契約看唐代民間土地買賣禁令的實效》（《敦煌研究》3 期）通過對敦煌吐魯番出土契約的考察，發現唐前期民間存在變相買賣和地下買賣兩種隱秘的土地買賣方式，表明官府嚴格執行土地買賣禁令，禁令存在一定的實際效力；中唐以後，民間土地買賣頻繁發生，表明禁令的實效逐漸消失，不過民間仍對禁令心存顧慮，往往在土地買賣契約中設置反恩赦條款加以預防。劉可維《敦煌本〈十王圖〉所見刑具刑罰考——以唐宋〈獄官令〉為基礎史料》（《文史》3 期）詳細分析唐宋《獄官令》中有關刑具、刑罰制度的令文，並據此考證敦煌本《十王圖》中的若干司法審判場面，通過文獻與圖像史料的對比研究，希望揭示唐宋間刑具、刑罰制度的變遷過程。趙晶《唐代“保辜”再蠡測——〈唐寶應元年六月康失芬行車傷人案卷〉再考》（《敦煌吐魯番研究》十六卷）主要圍繞吐魯番文書中的“康失芬行車傷人案卷”，對唐代保辜制度進行再探究。黃樓《吐魯番文書所見北涼解文的復原及相關問題研究》（《敦煌研究》3 期）通過對相關文書殘片的拼合整理，初步復原了北涼解文的基本格式。與啓、牒、關等文書不同，北涼解文以“言”為標誌。簡牘東漢解文中已見“言”字，北涼解文這一特點表明其與東漢

解文具有明顯的歷史傳承關係。吐魯番文書中所謂的“上言”文書多為當時解文的殘片。

三、社會文化

本年度有關社會文化的成果涉及發病書、習書、家具、占卜、節俗、體育娛樂、生育風俗等多個方面。《發病書》是中古稀見典籍，十多件敦煌寫本《發病書》殘卷的發現，彌補了中古傳世文獻之不足，為解決《發病書》在歷史上的存在與流行提供了有力證據，有助於保存並豐富唐宋時代的文獻典籍，並為中古醫療社會史研究提供了新素材。陳于柱《敦煌吐魯番出土發病書整理研究》2016年11月由科學出版社出版發行。其《整理篇》對流散於中外各收藏機構的敦煌寫本《發病書》逐一進行錄文、校注，尤其注重對不同收藏單位敦煌術數書殘卷之間的拼接與綴合，並正確釋錄敦煌文獻原件上朱書文字和朱筆校改。《研究篇》重點對敦煌寫本《發病書》進行文獻分類、定名與年代學考察，釐清文本之間的文化流傳問題，將敦煌《發病書》納入歷史學的研究視野之中，對唐宋時代及敦煌區域的醫療社會史進行深入研究。朱瑤《敦煌漢文文獻題記整理與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對題記的結構類型、內容特點及形制特徵進行分析，並將題記按所依附文獻分為佛教文獻、道教及三夷教文獻、四部文獻三類進行研究，通過對題記中所包含的寫造者身份、所寫經典、祈願對象等信息的分析，探討敦煌民間各種宗教信仰的發展和融合，以及敦煌官私學校教育的發展狀況。田衛衛《敦煌寫本北宋〈重修開元寺行廊功德碑并序〉習書考》（《文史》1期）重點分析了敦煌寫本北宋《重修開元寺行廊功德碑并序》等各殘片的綴合關係，並以盛行於中原地區的碑拓作品在敦煌被用作習書摹本這一事實，提示了北宋初年中原與敦煌在文化上的密切交流，同時也為研究同一寫本為何會寫有佛釋道等教、俗不同性質內容的敦煌文獻提供了一點素材。P.3257《後晉開運二年寡婦阿龍牒》由三件文書組成。其中第一件是寡婦阿龍的狀稿和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的指示，第二件是寡婦阿龍和其兄索懷義關於土地耕種的契約，第三件是歸義軍左馬步都押衙王文通詢問土地佔有者索佛奴、陳狀人阿龍、種地人索懷義的筆錄和曹元忠的批示。劉進寶《敦煌文書〈後晉開運二年寡婦阿龍牒〉考釋》（《敦煌研究》3期）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文書進行了校釋，並對內容進行了考辨。楊森《敦煌五代交椅家具考》（《敦煌研究》4期）指出，敦煌壁畫五代交椅家具的圖像可上溯至古埃及交椅家具，由此可探討與胡牀相關的交椅家具在中國從五代發展到清代的歷程及其演變，從而得出華夏區域出現的交椅家具與古埃及御用交椅的異同。

黃正建《大谷占卜文書研究(之一)——兼與敦煌占卜文書比較》(《敦煌研究》6期)以敦煌占卜文書為參照,為《大谷文書集成》的6件占卜文書予以定名,認為大谷占卜文書反映出來的占卜類型和方法與敦煌占卜文書大體相同,不同的只是遣詞方式與程序之繁簡。叢振《敦煌歲時節日中的遊藝文化——以上巳、端午、七夕為中心》(《敦煌學輯刊》1期)以上巳日、端午節、七夕節等相關節日為中心,對記載在其中的娛樂活動進行論述,以期對敦煌地區的遊藝文化研究有所貢獻。林春《元曲中女子蹴鞠的研究》(《敦煌學輯刊》2期)對元曲展現的貴妍多姿的女子蹴鞠風採進行巡禮闡釋,並從中擷取一些經典的蹴鞠場景,揭示它們深刻的內在淵源,有助於瞭解古代女子蹴鞠的發展脈絡和蘊含的文化,亦可為體育史的研究提供相關資料和有益的參考。叢振《先秦至唐五代角抵與相撲名實考辨——兼論敦煌壁畫、文獻中的相撲文化》(《敦煌學輯刊》4期)採用文獻資料法等對先秦至唐五代時期史料中的有關角力、角抵、相撲、弁、卜、手搏等稱謂進行遍檢,並以列表形式輯錄整理。鄭志剛、李重申《絲綢之路古代遊戲、娛樂與競技場地空間分佈考研》(《敦煌學輯刊》4期)利用考古發現的長安、敦煌、吐魯番等地的遺址以及文獻資料,從歷史遺址學研究視野,採用考察遺址分析和考古資料對絲綢之路古代遊戲、娛樂和競技場地空間分佈的遺址現狀有較為完整的認識。王澤湘、林春《漢唐樂府中的民俗體育研究》(《敦煌學輯刊》4期)解析了漢唐樂府中的體育民俗。蔣勤儉《從〈太子成道經〉求子情景探究敦煌求子風俗》(《西北民族大學學報》5期)從敦煌文學文本解讀角度深度挖掘其中所流露出來的敦煌地區的求子風俗,在求子時間、地點、所祭拜神靈、祭物、預測胎兒性別、重男嗣觀念等方面,敦煌和中原地區存在異同,這既與傳統文化對敦煌地區的影響有關,亦彰顯出敦煌地區本身濃郁的地域文化和佛教色彩。

四、宗 教

本年度宗教研究的相關成果主要涉及佛教、道教和景教。

敦煌殘卷的綴合不僅綴接了散失的寫本,更拼接出了撕裂的絲路文明。張涌泉、羅慕君《敦煌佛經殘卷綴合釋例》(《浙江大學學報》3期)指出,殘卷綴合有12個關鍵因素,包括內容相連、碴口相合、字體相同、書風近似、抄手同一、持誦者同一、藏家同一、行款近同、校注相涉、污損類同、版本相同、形制相同等。在具體的綴合實踐中,既要緊緊把握制約殘卷綴合的關鍵點,又要綜合分析各方面的綫索,使殘卷的綴合建立在可靠的基礎之上。張涌泉、朱若溪《敦煌本〈金光明經〉殘卷綴合研究》(《敦煌研究》1期)以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英國國家圖書館藏及甘肅省各家館藏為中心,通過內容、裂痕、行款、書風

等方面的比較分析,把其中的 31 號殘卷綴合成 9 組。張小艷《敦煌疑偽經四種殘卷綴合研究》(《敦煌研究》1 期)通過內容接續、殘字拼合、行款相同、字跡書風相近等角度的比較分析,將《無量大慈教經》《要行捨身經》《贊僧功德經》《佛母經》等 4 種疑偽經中的 26 號殘卷(片)綴合為 12 組(4+4+2+2)。借助於綴接後的寫本顯示的較為完整的信息,可對其形制、內容與性質作出更客觀、可靠的判斷。同氏《敦煌疑偽經三種殘卷綴合研究》(《浙江大學學報》3 期)將《齋法清淨經》《法王經》《十王經》這三經中的 32 號殘卷(片)綴合為 10 組。張磊、左麗萍《敦煌佛教文獻〈大乘無量壽經〉綴合研究》(《敦煌研究》1 期)通過對英藏、俄藏、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本《大乘無量壽經》殘片的內容、斷痕、行款、書風等方面的分析,將其中的 19 號殘片綴合成 9 組。張磊、周小旭《敦煌本〈大方等大集經〉殘卷綴合研究》(《浙江大學學報》3 期)將敦煌本《大方等大集經》中的 38 號殘卷或殘片綴合為 13 組。通過綴合除使原本本身首異處的殘卷或殘片重聚之外,還糾正了《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或《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條記目錄對北敦 9793 號、北敦 11119 號、斯 627 號等殘卷著錄信息的錯誤,更為進一步定名、斷代及校理創造了條件。羅慕君、張涌泉《敦煌遺書〈金剛經〉留支譯本考》(《社會科學戰綫》12 期)通過普查現已刊佈的所有敦煌文獻圖版、目錄及相關研究文獻,共搜集到可以基本確定的《金剛經》留支譯本寫卷 145 號,將其中 28 號綴合為 12 組;《英藏未定名敦煌〈金剛經〉殘片考》(《敦煌吐魯番研究》十六卷)把 34 號《金剛經》殘片綴合為 16 組。張磊、劉溪《敦煌本〈佛說佛名經〉(十二卷本)綴合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十六卷)把 21 號十二卷本《佛名經》敦煌殘卷或殘片綴合為 8 組,對進一步的整理研究具有重要意義。馬振穎、鄭炳林《英藏黑水城文獻〈天地八陽神咒經〉拼接及研究》(《敦煌學輯刊》2 期)首先拼接了英藏黑水城文獻中不少漢文佛經殘片;此外,通過比較西夏本八陽經與敦煌本、中原本的內容,可以大致瞭解西夏境內八陽經的來源,這對進一步研究西夏的佛教或許有所幫助。王曉燕《敦煌寫本〈維摩詰經〉注疏殘卷的綴合》(《敦煌吐魯番研究》十六卷)綴合了 3 組敦煌寫本《維摩詰經》注疏,這 3 組文書均未為歷代大藏經所收,亦未為歷代經錄所著錄。

方廣錫《談〈劉師禮文〉的後代變種》(《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 期)通過收集敦煌遺書乃至現代流傳本《劉師禮文》及其後代變種 16 種,梳理其異本,探討其演化,可以看出由《劉師禮文》體現的與時俱進並演變為種種形態的特徵、將自己裝飾為民衆喜聞樂見形式的特徵,以及它所具有的多種文化混雜的特徵,進而成為我們研究儀軌佛教演化的觀察點。敦研 256 號殘卷是一種佛教譬喻故事的“略要本”,乃供佛教司講唱的僧侶講說譬喻故事時所用。陳

明《佛教譬喻故事“略要本”在西域和敦煌的流傳——以敦研 256 號寫卷為例》(《文史》4 期)研究認為,敦研 256 號的形成既與印度和西域的胡語佛教譬喻故事的傳寫有關,也與敦煌所傳漢語佛教故事綱要本的形式相關,應該是印度佛教文學與中土文化混融的產物,對該類型文本的分析有助於進一步認識印度佛教文學的流傳及其對中土的影響。趙和平《敦煌本武則天御制經序再研究》(《石河子大學學報》6 期)指出,敦煌寫卷武則天御制《金剛般若經序》《妙法蓮華經序》《一切道經序》產生的背景與其為亡故的父母追福有關,雖以佛、道為外表,實則體現了儒家的子孝、母慈的底蘊。今年是歐洲學者開始翻譯中國古代西行求法高僧遊記的 200 周年紀念,也是《佛國記》第一個西譯本問世 180 周年紀念。王冀青《近代歐洲法顯研究之起源——中國古代西行求法高僧遊記西譯開筆 200 周年紀念》(《敦煌學輯刊》3 期)簡述了《佛國記》法譯本的翻譯背景及過程,以示紀念。王招國(定源)《敦煌遺書所見道甌〈設齋讚願文〉及其研究價值》(《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 期)以 3 號敦煌遺書道甌述《大唐開元十六年七月三十日敕為大惠禪師建碑於塔所設齋贊願文》為例,首先對其內容進行復原,以補正前賢錄文的遺漏;其次對該文獻的屬性進行討論,確定其為一篇佛教法會儀式中宣讀並表述設齋目的(齋意)的齋文;此外,研究還可揭示該文獻在研究唐僧一行生前事蹟及其與玄宗之關係、道甌生平與著作,以及唐代齋會等方面的價值。何劍平《佛教論義的記錄本及其東傳——以敦煌遺書及日本的維摩會為中心》(《敦煌吐魯番研究》十六卷)指出,敦煌遺書中保存了一批數量可觀、有即時性和當下性的論義文獻,對於我們重構唐代佛教論義的歷史面貌提供了珍貴的資料。張小艷《漢文〈善惡因果經〉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十六卷)從經文內容的分析比對入手,通過考察其中語段及特殊詞句在同時期翻譯佛經及中土文獻中使用的情況,推求經本成立的大致時代,並藉此探討《因果經》的真偽問題。景盛軒《敦煌大紙寫〈大般涅槃經〉敍錄》(《敦煌學輯刊》4 期)敍錄了 14 件敦煌本《大般涅槃經》,展示了這批寫經在紙型、紙色、紙長、裝潢、書法以及收藏諸方面的特色。趙陽《西夏佛教靈驗記探微——以黑水城出土〈高王觀世音經〉為例》(《敦煌學輯刊》3 期)指出,黑水城出土的《高王觀世音經》三種,其序文作為典型的佛教靈應故事,雖與前代類似傳說有所不同,但也有著傳承自隋唐五代的痕跡,同時也對偽經的傳播起到很大推動作用。

石小英《淺析 8 至 10 世紀敦煌尼僧居家生活》(《宗教學研究》2 期)指出,在 8 至 10 世紀的敦煌,尼僧作為出家人卻存在著與之相反的情況,她們常住在世俗家中,與家人共同生活,過著一種居家的生活。作者依據敦煌文獻記載,對這一現象及其原因作了說明。陳大為、陳卿《唐宋時期敦煌金光明寺

考》(《敦煌學輯刊》2 期)從寺名來源、存廢時限、寺院地址、佛寺建築、經濟狀況、僧人規模以及人事升遷七個方面探討了敦煌金光明寺的建置沿革和僧人情況。通過對敦煌文獻和傳統史料的梳理,進而認為該寺院名稱來源於佛教經典《金光明經》,起訖年代在公元 769 年至 1019 年左右,寺址位於莫高窟,寺院建築包括寺門、鐘樓、大殿、禪院、禪窟、堂、倉和僧人臨時性住房等,從吐蕃佔領敦煌到曹氏歸義軍時期該寺經濟狀況明顯改善,僧人數量顯著增長,由徒衆推選寺院三綱並經緇流領袖批准,在敦煌地區的影響力也大為增強。陳雙印、趙世金《歸義軍時期敦煌地區的佛教與軍事關係研究》(《西北民族大學學報》3 期)主要從敦煌地區軍事階層(將領、士卒)與佛教信仰的關係作為出發點,討論了他們信仰佛教的目的、方式以及信仰的對象。在文章的末尾討論了敦煌地區的佛教文學與邊塞文學中的軍事文學之間的一些關係。沙武田、梁紅《敦煌石窟歸義軍首任都僧統洪辯供養像考——兼論中古佛教僧人生活中的隨侍現象》(《敦煌學輯刊》2 期)經仔細梳理第 156 窟供養像的圖像和歷史信息,發現在第 156 窟洪辯像後跟隨著同為敦煌名僧的弟子悟真供養像,他們師徒二人一起出現在節度使張議潮的功德窟中。洪辯和其弟子悟真供養像在第 156 窟的發現,從供養像的角度,為敦煌佛教及歸義軍歷史的研究提供了新資料。日本杏雨書屋藏敦煌寺院經濟文書羽 677 和羽 703 為同一件文書而可以綴合。王祥偉《日本杏雨書屋藏敦煌寺院經濟文書羽 677+羽 703 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 期)指出,羽 677+羽 703 是公元 914—918 年間靈圖寺或金光明寺對本寺常住斛斗進行算會的底稿,它的存世不但豐富了敦煌寺院經濟文書的內容,為瞭解敦煌寺院經濟增添了新的資料,而且還由於其記載了張承奉、曹議金等歷史人物的活動而在認識歸義軍歷史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同氏《敦煌文書 BD15246(2)、P.3364 與 S.5008 綴合研究》(《敦煌學輯刊》1 期)指出,敦煌文書 BD15246(2)、P.3364 與 S.5008 是三件寺院會計文書殘卷,三者本為同一件文書而可以綴合,綴合後的文書內容是公元 947 年或 948 年報恩寺對本寺諸色斛斗入破情況進行算會後的上報牒文的一部分。

張元林《融通與移植:敦煌〈法華經〉圖像的靈活性選擇》(《敦煌學輯刊》3 期)對這種靈活性處理方式的意圖做了初步探討,認為這也是《法華經》及其信仰在敦煌本地傳播過程中的進一步豐富和發展。薛艷麗《〈莫高窟六字真言碣〉中四臂觀音像作者試考》(《敦煌學輯刊》3 期)指出,《莫高窟六字真言碣》和《重修皇慶寺記》兩塊碑中都記載有元代沙州路河渠司下的李世榮,而李世榮的身份是畫工,《莫高窟六字真言碣》中央的四臂觀音像就是由其所繪,奢藍令梅所刻;又《重修皇慶寺記》碑所載重修皇慶寺時所繪的壁畫及該

碑陽首上的二龍戲珠圖也應是李世榮等人所繪。楊波《克孜爾石窟第 38、100 窟“誓願”“授記”題材探討》(《敦煌學輯刊》3 期)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並參考庫木吐喇窟群區第 34 窟龜茲文榜題解讀的成果等,指出其中包含許多表現釋迦往昔供養諸佛的故事,這些故事與彌勒接受“摩頂授記”等場面一起,強調了“誓願”“授記”的主題。

三階教方面。楊學勇《三階教〈七階禮〉與佛名禮懺》(《敦煌研究》1 期)指出,大住聖窟所刻《略禮七階禮佛懺悔等文》與三階教《七階禮》有諸多相似之處,從《七階禮》的演變軌跡及大住聖窟對三階教的影響等方面可以確定《略禮七階禮佛懺悔等文》影響了《七階禮》,從中可窺《七階禮》的起始形態,並為研究信行的廣、略《七階佛名》提供了線索。同氏《也談〈佛說要行捨身經〉與三階教的關聯》(《敦煌學輯刊》3 期)研究認為,三階教典籍目錄乃至相關資料未曾提及類似《捨身經》的典籍,而且三階教教義中沒有對捨身的相關論述,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捨身經》是一部宣傳三階教教義的經典,就目前資料看來其與三階教沒有什麼關聯。

道教研究方面,主要包括道經考辨和道教儀式的考論。孫齊《敦煌本〈老子變化經〉新探》(《中國史研究》2 期)不認同將《老子變化經》斷代為南北朝成書的意見,而認為此經成書於漢魏時期。《老子變化經》中的“老子曰”部分在漢末就已經以讖書“王方平記”的形式存在。《老子變化經》的撰作目的並不是為了神化老子,而是為了神化漢末東海郡方士王方平。郇同麟《敦煌吐魯番道經殘卷拾遺》(《敦煌學輯刊》1 期)收集了前人未發現或未正確定名、綴合的三十餘件敦煌吐魯番道經殘卷,並分別做了定名、綴合和簡要描述,並著重對中國國家博物館所藏的一件吐魯番佚名道經殘片的宗教思想做了考證。劉永明《敦煌本道教〈十戒經〉考論》(《歷史研究》1 期)指出,《十戒經》傳授針對的是在家初級信仰者清信弟子,於是成為道教通往社會的一座重要橋樑,從而有利於道教的傳播,並對社會基層的宗教信仰乃至道德教化產生一定的影響。王承文《敦煌本〈靈寶經目〉與古靈寶經出世論考(上下篇)——兼對古靈寶經出世時間下限的考定》(《敦煌學輯刊》2、3 期)通過對敦煌本《靈寶經目》形成過程及其內在結構的考察,認為這部經目與古靈寶經最核心的教義思想具有高度的連貫性。現存《靈寶經目序》和敦煌本《靈寶經目》則屬於兩種具有內在關聯而且相互高度依存的文本。因此,陸修靜《靈寶經目序》所說的《靈寶經目》,其實就是指現存敦煌本《靈寶經目》。而敦煌本《靈寶經目》亦證明,在公元 437 年陸修靜整理古靈寶經之前,所有古靈寶經均已出世。至於陸修靜本人及其“身邊的道士們”則均屬於古靈寶經的尊奉者,並未參與過古靈寶經的創作。張魯君、韓吉紹《四件敦煌道經殘片考辨》